

阿根廷工潮與政局的展望

王建勛

壹 政局演變

阿根廷共和國 (Argentine Republic) 位於南美洲南部；東北鄰烏拉圭、巴拉圭和巴西，北連玻利維亞，西接智利，東瀕大西洋，面積二百七十七萬八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五百萬，為南美洲第二大國。

阿根廷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原為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一六年脫離西班牙統治獨立。阿根廷獨立後，在國內政治上就產生兩大政黨——中央集權黨與聯邦主義黨。兩黨相持不下，時起內戰。一八五三年，羅沙斯 (Juan Manuel de Rosas) 領導各省召開制憲會議，仿效美國的聯邦、共和及代議制，創立阿根廷憲法，這纔緩和了兩黨鬥爭的情勢，使阿根廷走向富強統一的途徑。待至歷史家米特萊 (Bartelone Mitre) 及教育家薩爾門多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出任總統，由於他們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更使阿根廷走上新興的局面——移民不斷增加，商業受到鼓勵，阿根廷的經濟亦跟着突飛猛進起來。

但至十九世紀末期，因歐洲移民大量湧入，中產階級增加以及工業的擴張，均對阿根廷的政治思想及黨派政治發生強烈影響，因而國內政治又產生保守與激進兩派的鬥爭。一八九〇年，人民激進黨成立，全國不安已達巔峯。一九三〇年，屬於保守派的越布魯 (José F. Uriburu) 為整頓國內政治及應付因世界不景氣而引起的經濟危機，乃採取獨裁手段，壓制工會，實施新聞檢查，並禁止人民激進黨參加選舉等。一九四〇年卡斯狄羅出任總統 (Ramon S. Castillo)，更對人民激進黨及一些民主政黨實行壓制，結果引

起羣衆暴亂，軍人貝隆 (Juan Domingo Peron) 乃乘機推翻卡斯狄羅政府，而實行了十二年的軍事統治。

貝隆在一九三七年，曾出任奧鐵茲 (Robert M. Ortiz) 政府的勞工部長，因其在勞工部長任內與勞工羣衆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所以在他推翻卡斯狄羅政府以後，就獲得勞工羣衆的支持，擊敗民主同盟順利的當選了總統。貝隆是一個極端國家主義者，他要使阿根廷成為富強自足的國家，乃推行五年計劃，加強全國工業化發展。在此一計劃下，握有國家經濟命脈的農牧生產已不被重視，牛、羊及小麥等農牧產品輸出減少，國家經濟受到挫折。因為國家經濟每況愈下，稅捐繁重，在全國不滿氣氛中，貝隆威望開始低落，他與軍隊間的關係亦隨之減弱，終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因陸、海、空三軍叛變，被迫退職出國。

貝隆雖然流亡海外，對國內政治還有很大影響，尤其是貝隆所擁有的勞工羣衆，成為此後歷屆政府最大的困擾。所以軍方極力壓制貝隆勢力再起，並且經常不滿意政府對貝隆主義分子的軟弱態度而發動政變。一九六二年三月，法朗西斯 (Arturo Frondisi) 總統就在此種情形下被推翻。一九六三年十月，阿根廷舉行總統及國會議員選舉，軍方又壓制貝隆主義分子，迫使其退出選舉，在極緊張與混亂情勢下，人民激進黨的伊利亞 (Arturo U. Illia) 當選總統。

一九六三年十月，伊利亞就任總統以後，為謀求國內寧靜與和平，對貝隆主義分子採取較為溫和的政策；但貝隆主義分子却乘機擴張勢力，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時，獲得了勝利，因而又激起軍方不滿，認伊利亞總統處理不當，於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陸軍發動政變推翻了伊利亞政府。

軍事政變以後，即由陸、海、空三軍組成軍事政府，推舉已退休之前陸軍司令奧干尼亞（Juan Carlos Onganía）為總統，宣佈解散國會，禁止所有政黨活動，聲言要澈底清除貝隆主義分子。為了防制共黨及貝隆主義分子乘機鼓動勞工製造事端，奧干尼亞總統一方頒佈全面防止任何極端組織活動的法令，一方加強對工會控制。但事實上，貝隆主義分子所鼓動的勞工運動，迄今仍困擾着奧干尼亞政府。

貳 經濟危機與工潮發展

因貝隆而造成的國家政治長期動盪不安，主要是由於勞工問題所引起；而勞工問題的產生，又與國家經濟危機有着密切關係。所以這裏先從阿根廷的經濟情況談起：

阿根廷有天然遼闊的草原，自殖民時期以來，該國就開拓了畜牧經濟，至今全國仍有十分之七人民從事農牧。牛肉、小麥及其他農業和牲畜產品，佔輸出貿易總值的九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阿根廷農牧產品大量向海外輸出，使阿根廷的經濟逐漸走向繁榮。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輸出市場被切斷，航運受阻，阿根廷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大戰以後，貝隆政府加緊發展全國工業化，雖使工業生產總值較戰前幾乎增加一倍，在一九六〇年以後，各種工業生產已接近自給自足地步；但相反的，由於工業發展迅速，人民棄農從工，紛紛湧向都市，農業及牧畜生產開始下降，輸出減少，因而國家外匯減少，預算赤字增加，通貨開始膨脹。政府為減少赤字，需要更多的嚴厲管制與措施。由於政府的節約計劃，各項稅收增加與生活指數提高，引起工潮及不安狀態。一九六二年，乾旱又嚴重影響農田和牧場，農牧生產減低，經濟亦隨之陷入了危機。據當時美國「時代周刊」估計：在一九六二年，企業破產案件增加四六%、生活費用上漲五〇%、比索（Peso）貶值六七%、國民生產總值減少三·九%、國家赤字已達三億二千萬美元、黃金與外匯儲備金已從三億五千一百萬減為一億八千萬美元；此外，尤其嚴重的是，阿根廷首次遭逢工人失業問題。一九六二年，失業工人即高達七十萬人。勞工對政府不滿，懷念貝隆，造成貝隆與勞工不可分的關係。到了伊利亞出任總統時期，經濟情況毫無改善，且對勞工又多放任，致工會組織更為貝隆

主義分子所把持。

奧干尼亞總統執政以後，面對着經濟危機，就採取了一個非常措施。一九六六年八月，他宣佈結束三年來政府對外匯的管制，並宣佈自軍政府成立以來，第二次貨幣貶值。奧干尼亞總統認為經濟危機，主要是來自於外匯枯竭，所以他呼籲阿根廷人民努力增加輸出，以遏止通貨膨脹，吸收外資，以遏止外匯的枯竭。（註一）但是奧干尼亞總統的非常措施，却在內閣中發生歧見，因而又引起了政治危機。

一九六七年一月，奧干尼亞改組內閣，一方任命經濟管理家卡里傑爾（Krieger Vasena）為經濟部長，使其建立一個新的經濟政策；一方又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凍結工資和貨幣再度貶值。一九六七年三月宣佈比索貶值四三%（註二），四月宣佈凍結工資。但此後由於奧干尼亞總統仍繼續進行大水壩、公路網以及擴充軍備的計劃；一九六七年十月，阿根廷政府曾向法國購買六億美元的武器和軍事裝備，又刺激了物價的波動。在一九六七年一年中，生活費用上漲三〇%，使奧干尼亞總統在一九六八年即將解除凍結工資的諾言無法實踐，並且還迫使政府對於一些生活必需品如肉類和麵包實行了限價。在此種情況下，勞工階級受害最深，所以全國勞工階級就動員起來反對政府。

當十九世紀末期，勞工黨成立之時，勞工組織已參加政治，並顯示了在大選中的力量與政府間的關係。其後由於阿根廷工業日益擴張的刺激，工會組織擴張甚速。一九四〇年後，運輸、碼頭、印刷、麵包、罐頭及許多新興工廠均紛紛建立工會，並且這些工會均納入工會總會（Confederac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組織之內。迄今參加工會總會的工人約達三百多萬，而且多數工會均為合法具有與資方談判工資條件的權利。

工會領導「勞工運動」，是於一九四六年貝隆主政時期開始的。貝隆上台以後，國家政治經常受到貝隆主義勞工羣衆勢力的威脅，軍方與貝隆主義分子敵對，以致「勞工運動」更加激烈起來。阿根廷的政治亦就經常受到革命、陰謀、經濟危機的影響，造成不安動搖的局面。

自一九六七年初，奧干尼亞總統宣佈工資凍結以來，更引起勞工的憤慨。工會一再要求政府解除工資凍結未果，形成政府與工會僵持的局面。一九六八年初，工會總會在阿根廷所有報紙上刊登聲明，表示阿根廷已有一百五

十萬人失業，且由於工廠癱瘓，生活費用增高，工人所得已不能維持溫飽，要求政府取消工資凍結的措施，解除對工會的控制，並指出由於政府對鐵道、冶金、紡織、化學、碼頭、船塢工會的控制愈來愈深，將會加深工人反抗政府的危機。工會總會的聲明未能獲得政府反應，因而政府與工會間的關係就愈加惡化起來。

奧干尼亞總統不能容忍勞工羣衆阻礙政治，乃一直採取壓制，所以他把碼頭工會領袖多羅薩(Eustaguiro Tolosa)判了五年的監禁，並不斷拘捕貝隆主義分子。然在不斷施以壓力下，一些工會領袖的行動，已有被共黨、反政府分子以及天主教左翼聖職人員所利用的趨勢。事態的發展，亦確實使奧干尼亞總統感到憂慮。因此，奧干尼亞總統才決定先與冶金工會領袖達爾科捏(Luis Talcone)和紡織工會領袖梵多爾(Augusto Vador)等展開談判，並希望他們能說服工會，不要干與國家政治的紛擾。在此次談判後，冶金、紡織、石油、建築、電力等工會，表示願意與政府合作；但另外一些如電信、礦業、鐵路、製糖、汽車、化學、銀行等工會，因為有的已被共黨滲透，有的仍堅持保持貝隆主義的立場，拒絕與政府合作，並聲言將另組工會總會，繼續反對政府。待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廿八日，工會總會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城(Buenos-Aires)召開勞工大會的時候，「合作派」與「獨立派」正式宣告分裂。雖然「合作派」的工會仍希望統一，又在五月卅日再度召開勞工大會，選舉新的總工會主席；但因兩派相持不下，仍未能獲致結果，最後只組成了一個新的工會總會委員會。

新委員會主張重新與政府談判，但遭到貝隆主義分子、「獨立派」工會領袖翁加洛(Baimundo Ongaro)的反對，並決定發動工人罷工與示威。在一九六八年六月，科多巴(Cordoba)省汽車製造廠的工人就展開大規模示威，並與警察混戰。六月廿八日，門多薩(Mendoza)、吐庫曼(F Tucuman)、聖非(Santa-Fe)等省的工人隨之響應。七月廿八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科多巴、巴塔(Plata)、羅沙路(Rosario)的工人又展開抗議奧干尼亞政府兩周年紀念大示威。他們的口號是反對奧干尼亞政府的「寡頭政治」與「美國帝國主義」。在與警察衝突中曾有多人受傷，數百名工人被捕。此外，「獨立派」的工會向政府要求解除工資凍結，恢復碼頭工會領袖多羅薩的自由、釋放所有在罷工示威中被捕的工人、建立民族主義的銀行制

度、實施農業改革等。最後並向政府表示勞工的鬥爭，是要達成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革命」，以此種革命來保證國家的真正獨立。

叁 「革命運動」與「政治革新」

貝隆主義號召下的勞工運動，不僅是聯合勞工羣衆，而且也要達成與其他一切反政府勢力結合成一種同盟。此一政策，在一九六六年時，曾因貝隆主義領袖人物阿爾埃得(Bernardo Albarte)的反對而未成功。後來，一九六七年初，曾在貝隆時代任外交部長的洛莫里諾(Jeronimo Romorino)前往馬德里與貝隆會商。他返國後就試圖領導貝隆主義分子與其他反政府力量的結合。這些反政府的力量，可分爲下列四種：

一、民主運動：人民激進黨自一八五八年執政以來，已是阿根廷第一大政黨，屬於該黨的前總統伊利亞、副總統貝萊特(Carlos Perette)被推翻以後，該黨分子一直要求奧干尼亞恢復民主。其後由曾任軍校校長並已退休的康地多(Adolfo Candido Lopez)將軍領導的一些退伍軍人以及前國會議員們所組成的「民族主義革命運動」，與激進黨人士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聲言組織「民族陣線」。他們反對軍事獨裁，主張恢復民主，並且要開闢一條「人民革命」的道路，以改變阿根廷各種不合理的結構。康地多被捕以後(註三)，已退休的前第二軍區司令卡洛(Carlos A. Caro)就成了該陣線的發言人。

二、宗教運動：阿根廷人民有九二%是天主教徒，並且憲法還規定總統、副總統必須是天主教徒。因為主教係經由國會呈請總統任命，羅馬教皇的訓諭必須經由總統傳達。天主教對國家政治影響以前並不甚大，但自貝隆總統倒台以後，天主教在國家政治上的影響開始混亂，一些左翼聖職人員經常對政府表示不滿。一九六八年一月，吐庫曼省(Tucuman)的一些神父煽動工人罷工。後來又由於當地主教阿拉貢(Mgr Segundo Aragon)拒絕接受吐庫曼當局所提出的抗議以後，首先造成政、教衝突。同年二月十三日，吐庫曼十六位神父公佈了阿根廷十八位中立派主教的一項文件。該文件指出阿根廷西北地區如吐庫曼、聖非(Santa Fe)等地農民與工人的貧苦，已達無法生存的地步。並說明這是因為這些地區製糖工業的危機，一些

大製糖廠紛紛倒閉所造成的結果。蔗農與製糖工人都受到嚴重傷害。有很多沒有工作，而在飢餓線上的蔗農與工人，經常向當地駐軍討取剩飯吃。

一九六八年三月，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位西班牙籍神父費爾南德斯(R.P. Jesus Fernandez Novos) 亦公開攻擊阿根廷政府沒有「正義」，使國家接近「暴力」邊緣。在他被驅逐出境以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教阿格尼爾(Mgr Antonio Aguirre) 就聲明阿根廷的社會確實是不公道的。他表示在此種情況下，只有迫使人民選擇「暴力革命」的唯一道路。結果他以煽動人民武裝暴亂的罪名被拘捕。事實上，這些聖職界的言行，已直接影響阿根廷的民心嚮往於「暴力革命」。

三、學生運動：在一九六六年七月軍事政變以來，奧干尼亞始終拒絕解除禁止學生自治活動的禁令；但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學生反「美帝國主義」及反越戰的暴亂却一直也沒有停止過。阿根廷政府曾以大學已被共黨滲透的理由，接管了九所國立大學。一九六七年三月，學潮一度平息；但到一九六八年初，因各地工潮迭起，學生又在要求改革教育、恢復民主及反「美帝國主義」的口號下，發動暴亂，並且有很多學生參加工人示威的行列中。政府為制止學生暴亂，曾在巴塔省(Bata) 拘捕了六百多名從事暴亂的學生。

四、右派黨反對派的活動：在國內政治混亂中，政府內部亦告分裂。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出任駐美大使已有兩年的阿爾瓦洛(Alvaro Alsogaray)，在一九六八年八月，為不滿奧干尼亞總統長期不恢復民主，突然辭職返國。由於他對奧干尼亞總統不斷譴責，使政府中的右派更加分裂。無形中他已成為政府中右派反對派的領袖。這羣反對派份子亦在鼓動恢復民主政治的活動。

這些反政府勢力，加以共黨推波助瀾，已給奧干尼亞政府帶來很大威脅，而「勞工運動」、「民主運動」，以及「民族主義運動」，在反政府前提下，又都有結合的趨向。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共黨、貝隆主義黨、人民激進黨、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就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除了奧干尼亞政府實行大選、選政於民，他們也除了領導「人民革命」以外，將無其他選擇。(註四)

因此，奧干尼亞在三月五日就召集內閣、三軍領袖以及政府各部門高級

官員舉行非常會議。奧干尼亞首先警告說：「阿根廷人民這種熱衷於『革命』的情勢，將會造成國家的災害。……由於政府各部門失去效能，造成了『國家革命』工作的癱瘓」。他指出：「政府各部門在早晨十點鐘仍空無一人，而這些人都在忙於自己的商業和其他私務」。他接着說：「國家在面臨極其不安的情勢，而你們還不表現出力量來；但當你們了解，需要堅強起來的時候，可能已沒有機會了」。(註五)接着在三月八日，國家發展委員會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公佈了一個很長的文件，暗示政府已在研究恢復民主體制；但在條件上還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文件中還提出幾點重要建議：政治方面，政府決心加強防制天主教的進攻，但政府却將儘量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結構。勞工方面，政府要研究一個勞、資間的平衡關係，並建立一個政府與勞、資間的合理關係。經濟方面，在國家管制下的企業，雖應給予自由，但不准有獨佔事業。在這個文件公佈以後，阿根廷的輿論仍舊批評政府沒有「清楚的目標」以及「遠程的計劃」。屬於保守派的國防部長安特尼奧(Antenio Lanusse) 也不同意三月五日奧干尼亞總統所表示的「人民革命」已發展到嚴重階段的說法，而突然辭職，內閣因之發生動搖。

五月間，奧干尼亞總統再對政府官員解說「國家革命」的目標。他說：「我們當前的任務是使國家革新，所以必須要對當前國家經濟及社會結構作徹底改革。因此，無論是政府或個人，在生活與觀念上，都要合乎『現代化』的標準」。但他強調「國家革命」要在「和平」與「安靜」中進行，所以首先要把教育制度建立在自由基礎之上，使智識份子亦能担負起此一革命目標的責任。最後他呼籲說：「我們的任務，不是破壞幾個世紀以來所建立的國家，而是要配合時代獲得更多的成果，所以我們只有『團結』、『統一』才能克服任何障礙」。(註六)

肆 傾向歐洲與新經濟政策

阿根廷在長久面臨着一個難以解除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情況下，使奧干尼亞總統不得不強調「國家革命」。在這個目標下，他任命梵恩(Genilio Van Peborgh) 為國防部長，並改組了部份內閣。他召開廿四個省地方首長會議，付與各省更多的有關社會及經濟改革的任務與權力。此外，更重要的是，

奧干尼亞總統決心要修改他的經濟政策，以求國家經濟情況能獲得好轉，因此，他譴責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已不適合，認為美國雖重視拉丁美洲的安全，却忽略了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所以他要脫離美國的影響。（註七）在一九六八年中，奧干尼亞總統不斷推動政府增加對歐洲的貿易，重新建立肉類及小麥等農牧產品在歐洲的市場。

事實上，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卡里傑爾出任經濟部長以後，阿根廷就仿倣西歐國家的「經濟穩定」政策，阿根廷雖然仍要繼續興建各種大的工程，以從事工業化的發展；但是亦注意到阿根廷的鄉村，目前仍停留在貧窮與落後的狀態，並且還有上百萬的工人失業。在工業建設中，要不使社會各階層受到傷害，必須要先求得社會與經濟的穩定。在一九六七年十月，阿根廷外交部長科斯塔（Nicanor Costa Mendez）就為了這新經濟政策訪問歐洲。

（註八）他臨行前曾聲明：「阿根廷不僅在自然關係上團結着南美洲國家，同樣更重要的是爭取歐洲國家的合作」。所以在他訪歐以後，阿根廷與歐洲——特別是與西歐國家間的經濟與貿易關係就密切起來。我們從一九六八年中的一些具體事實上可以看出：

一、阿根廷獲得西德五千萬美元貸款。西德西門斯（Siemens）公司承擔「阿根廷阿杜恰（Atucha）原子工廠和電話網的建造。西德克魯伯（Krupp）公司亦參加了阿根廷冶金工業的擴充。在一九六八年底，西德西門斯公司又表示有意接受阿根廷在科多巴建造第二個原子工廠的合同。此外西德還以技術援助阿根廷建造潛艇。

二、義大利協助阿根廷農牧產品進入歐洲共同市場。此外並協助阿根廷建造衛星通訊站。

三、西班牙購買了阿根廷五萬五千噸肉類。

四、法國除增加了阿根廷肉類進口，並以貸款方式供給阿根廷新的航空裝備及軍事物資。此外兩國達成太空合作。法國並以技術人員及材料協助阿根廷製造噴射機。

這些成果，尚未使阿根廷方面感到滿足，一九六九年三月廿三日，阿根廷外長科斯塔又帶領一個代表團訪問英國以外的所有西歐國家（英國與阿根廷對於接連阿根廷的福克蘭羣島（Falkland）的爭執，一直影響兩國的貿易關係）及東歐的羅馬尼亞（註九）。在他訪問中，他曾再度強調阿根廷與歐

洲國家間的關係說：「阿根廷傾向歐洲，是很自然的事。因為阿根廷人民多是愛爾蘭、德國及義大利的後裔」。當然在這次訪問中，阿根廷又獲得不少利益，尤其是在法國。關於阿根廷海運的擴充，為了開發布宜諾斯艾利斯電力的查貢（Chocón）大水壩、新的通訊裝備、原子動力等，法國均允以協助。阿根廷還要請法國派遣專家協助阿根廷從事火箭的建造。不過在法國方面，則要求法國彩色電視對阿根廷的輸出，並且還要求法國語言在阿根廷教育上的特殊地位。

伍 今後政局發展與外交動向

勞工問題不能獲得解決，當是阿根廷長期政治不安、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經濟危機固然使國人不滿，但在經濟危機中所暴露出的各種結構上的弱點，更是人民對政府的最大反感。所以貝隆主義分子纔能挾持勞工示威，「勞工運動」、「宗教運動」以及「民主運動」得以「民族主義革命」的口號煽動羣衆，使勞工問題變得更为複雜。「勞工運動」不單受到政治團體及天主教的支持，並且阿根廷共黨在最近秘密召開的第六屆共黨大會，亦在爲勞工羣衆助威。所以本月初，在吐庫曼、聖非等地區的工人示威活動中已採用了「暴力」。並且「勞工運動」的發展，亦是從起初單純要求解凍工資，而變成爭取工人在國家政治上的地位問題了。然而奧干尼亞總統的作法亦在改變，他爲阻止此一逆流的發展，表示在暫時不恢復選舉的情況下，開放政黨活動，採取「黨派合作」措施，政府願意與各政黨合作。此外，他亦答應了天主教會的要求，徹底實行經濟與社會改革工作。預料阿根廷由於勞工問題所造成的緊張情勢，假如政府與各黨派取得合作，今後可能會逐漸緩和下來。

至於阿根廷要脫離美國的影響，而與歐洲國家合作，是包含有兩個動機：其一是經濟方面的。阿根廷是以貿易致富的，曾是世界上十五個首席貿易國家之一；但自一九六〇年，阿根廷對外貿易重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以後，由於美國農牧產品市場價格極不穩定，改變了阿根廷以前對歐貿易一直保持出超的紀錄。近年來因對美貿易年年入超，美元外匯枯竭，已無力採購機器及各種原料，使國內一般工業遭到打擊，加深了經濟危機。其二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阿根廷人民長久以來都在保持着一個「大阿根廷」的哲學基礎，

並不熱心於美洲國家間的任何合作——包括軍事及經濟合作在內，而努力以赴的，則是以阿根廷為中心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團結，完成一個美國、歐洲、與拉丁美洲的三角關係。在這個目標下，它就特別要加緊工業建設，尤其要努力擴張在科多巴省已有廿年歷史的軍事工業。在其軍事工業國家化的目標上，已有很多大兵工廠建立起來。現在已能以長期付款方式，供應武器給他拉丁美洲國家。這些都顯示着阿根廷是想以其工業高度的開發及武器的現代化，來增加阿根廷在南美洲國家關係上的聲望。就如今年四月二日，奧干尼亞總統對其政府官員訓示說：「目前阿根廷仍不足以應付當前的國際複雜環境，所以阿根廷必先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使其能參加到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註十）

基此理由，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可能有所更張，尤其是阿根廷外長科斯塔此次訪問西歐國家途中，亦曾到了羅馬尼亞，這更說明阿根廷今天雖然仍與西方世界在一起；但在行動上，將可能採取更獨立的外交政策，與歐洲共黨國家也建立關係。

註一：參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島日報。

註二：阿根廷比索（Peso）與美元之比率：一九六二年為一五六比一，一九六五年為一七八比一，一九六六年為二五〇比一，至一九六七年為三五〇比一。

註三：康地多（Adolfo Candio Lopez）在一九六七年曾被三次拘捕，都是經過十五天拘留而被釋放。一九六八年三月，他聯合共產黨、天主教及各政治團體組織「民族陣線」，支持反政府示威，迫使政府恢復民主。因而軍方乃以「勾結共黨從事顛覆」的罪名將他監禁在靠近智利邊界的拉哈斯（Las Lajas）地方。

註四：參閱1968, 8/3, Le Monde.（法國世界報）

註五：參閱1968, 8/3, 12/4, Le Monde.

註六：參閱1968, 10/7, Le Monde.

註七：同註四。

註八：參閱本刊第七卷第四期拙著「南美洲軍備競賽與美國的反應」。
註九：科斯塔（Nicanor Costa Mendez）此次訪歐中，特別偏重西德與法國，他在西德訪問期間，曾到了各聯邦首都如：Stuttgart,

Berlin, Kolagne, Bonn, Baden, Frankfurt等地。他亦在法國停留六天，然後到馬德里，最後訪問了羅馬尼亞。

註十：參閱1969, 3/4, Le Monde. M. Henry Janieres; Le Général Ongania Definit Les Objectifs à Long terme du Gouvernement.

——上接第38頁——

其中軍事計劃，又佔了總預算的百分之四十。因為葡萄牙政府為了追擊游擊隊及鎮壓暴動，經常要維持相當數量的軍隊。我們可自葡萄牙人員傷亡的數字以及超過葡國目前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的經費支出上，看出葡國對鎮壓非洲屬地的叛亂，曾付出了相當代價。

直至目前為止，葡屬非洲的民族主義領導份子們，仍未有任何決定性的行動。多年以來，他們一直在深切地期望着國際輿論，能對葡萄牙政府施以壓力。另一方面，仍寄望於葡萄牙政府對殖民地的措施，有所改進。此次葡國總理加丁諾的訪非，無論在安哥拉、莫三鼻，或幾內亞，均一再強調葡萄牙政府堅持對游擊份子作戰到底的決心。因此，他們對後者的期望，已告破滅。

葡屬非洲地區所發生之動亂，已引起了許多國家的注意。尤其是日本及西德兩國，顯著的希望能在葡屬的非洲領土內，建立市場和移民。

整個葡屬非洲，目前仍籠罩着流血及暴動的危險。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靠葡萄牙政府拿出更合理的政策來扭轉這種趨勢。但至現在為止，葡萄牙政府似乎犯了一項錯誤，那就是正在嚴厲地抑制着其非洲領土對自由的要求。如此下去，恐將迫使其非洲屬地的獨立運動，更走向流血的一途。

註一：見 African World, May, 1968. P. 7.

註二：見 Le Monde 30 avril, 1969.

註三：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4, 1969.

註四：見 Le Monde 20—21, avril, 1969.